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王金伟^{1,2,3}, 孙洁^{1,2}, 王国权⁴, 钱莉莉⁵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旅游科学学院, 北京 100024;

2. 北京旅游发展研究基地, 北京 100024;

3.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4. 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 天津 300350;

5. 浙大城市学院 国际文化旅游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城市正规就业的重要补充, 在缓解城乡就业压力、刺激城市经济增长、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探究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均较低; 职业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 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在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性别在职业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职业境况和民生福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并能为相关部门制定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城市旅游; 旅游就业; 非正规就业; 主观幸福感; 职业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3)06-0028-14

基金项目: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课题“北京文商旅融合发展机制与战略路径研究”(ZS2022B04); 原国家旅游局科研项目面上项目“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现状与规范化管理研究”(17TABG014)。

作者简介: 王金伟(1983—), 男, 四川绵阳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旅游地理; 孙洁(1997—), 女, 河北衡水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旅游消费者行为学; 钱莉莉(1985—), 女, 浙江杭州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旅游、数字文旅、旅游规划。

通信作者: 王国权(1994—), 男, 江苏连云港人, 2021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非正规就业、旅游消费者行为。

就业事关民生福祉,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保障我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遵循。非正规就业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正规就业的新型灵活就业形式^[1],在缓解就业压力、保障城镇化平稳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规模已超过2.6亿人,约占城镇劳动者总数的60%,是城镇就业的重要渠道^[2]。同时,以非正规就业为核心的非正规经济已成为正规经济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经济系统中占有一定比例,并且目前处于持续增长状态^[3]。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是新型城镇化和现代旅游业融合发展的产物,作为旅游正规就业的重要补充,其在释放特定人群劳动力闲置价值、刺激旅游经济增长、提升旅游者消费满意度等方面作用显著^{[4]134.[5-8]}。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或不具有正式劳动关系,旅游非正规就业人员常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排斥和不公平待遇,甚至被视为“越轨者”^{[9]67}。同时,受收入水平、社会态度、就业政策等多维因素的影响,该就业人群的幸福普遍较低。此外,由于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人群具有高流动性、高隐蔽性、高偶然性等特点^[10],如何对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非正规就业现象进行科学化、规范化治理,高效发挥其正面效应,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为案例地,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度,并进一步探索该群体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通过本研究,希望能够为提升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质量和做好非正规就业的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并进一步丰富旅游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理论研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概念,它常用来形容小规模、不经政府管理,甚至被一些国家法律法规抵制的经济组织或小商贩等^[11]。由于非正规部门是以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收入来源为核心,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替代概念“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有时也被称为“隐性经济”(hidden economy)或“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并从中自然引申出“非正规就业”一词^[12-13]。Montero - Moraga等指出,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不受劳动法规保护的就业方式^[14]。万向东从更

为广泛的视角提出,非正规就业是指具有非正式的雇佣关系、未进入政府征税和监管体系、就业性质和效果处于低层次和边缘地位的劳动就业^[15]。尽管学者们对于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诸多探讨,但是其定义仍莫衷一是,尚无统一定论。然而,通过现有相关文献,可以管窥出非正规就业的以下共同特点:(1)政府管治方面,非正规就业常游离于正式的社会经济制度之外,大多缺乏政府部门的认可和管制;(2)劳动关系方面,非正规就业形成的劳动关系往往较为松散、雇佣方式灵活,但缺乏有效的劳权保障;(3)经营特征方面,非正规就业一般具有低门槛、高自由度、经营方式灵活等特征。

旅游非正规就业是正在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商业活动,但缺乏正式和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类特殊就业形式^[16],其主要可分为流动摊贩、照相服务、商品倒卖、旅游交通(包车、出租车司机)等多种类型^[17]。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大量存在,给城市管理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挑战。学者们发现,旅游非正规就业领域常常存在占道经营、质量低劣、价格欺诈、辱骂殴打游客等乱象,破坏了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缺乏专业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引导,其提供的旅游服务欠缺规范性,难以有效满足游客的需要^[18]。因此,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有效监管,已成为城市旅游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些管理者认为应该严格管控该群体,甚至采取高压政策予以取缔。梁增贤和保继刚认为,旅游非正规就业管理应侧重于“疏”,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个走向正规化的平台,规范其经营方式、活动空间和从业范围等^[19]。此外,ÇelikUguz和Kaya提出,为了消解旅游非正规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保护其合法权益,应该广泛地从法律法规、教育培训、监管体系等方面构建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20]。可以看出,旅游非正规就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多重要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取缔了之,也不能一味地弃之不管。

(二)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源于积极心理学,是指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即人们对生活的认知和情感评价^[21]。总体而言,主观幸福感可以分为情感性和认知性两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可以分为生活满意度、愉快情感和不愉快情感3个维度。其中,生活满意度指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属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愉快情感和不愉快情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体验的情感评估,属于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22]。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由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心理状态。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会受到自然、社会等外在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自我感知和心理暗示等内在因素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此

外,学者们还提出,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收入水平等人口学要素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23]。总的来看,主观幸福感表征的是个体对自身某一阶段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会受到多方面的综合影响。

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幸福感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总体而言,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幸福感普遍较低。卿石松和郑加梅基于2003—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提出非正规就业不仅对幸福感有直接的负向作用,还会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对幸福感产生间接的影响^[24]¹³⁴。丁述磊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普遍偏低^[25]。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影响非正规就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剖析,发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经济收入等人口学因素是重要影响要素。费星星提出,非正规受雇和非正规自雇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同时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劳动者^[26]。王海成和郭敏认为,由于女性非正规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就业歧视,因而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27]⁵⁰。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如何提高非正规就业人群就业质量,并切实增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非正规就业规范化管理和增进民生福祉过程中的重要议题。虽然已有相关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会显著负向影响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但是总的来看,学术界对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尚缺乏关注,特别是少有学者将三者统合于城市旅游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在参考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假设(H1~H5),并试图通过这些假设的验证进一步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影响机理,以丰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理论研究并为城市旅游市场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H1: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正向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H2: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H3: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H4: 生活满意度在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5a: 性别在职业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H5b: 性别在职业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H5c: 性别在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区域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每年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游客。北京市统计局相关资料显示,2019年全年北京接待游

客超3.22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224.6亿元^[28],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北京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岗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管,北京市旅游非正规就业在管理制度、社会保障、法规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选取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故宫博物院、颐和园、什刹海公园、南锣鼓巷等典型景区及其周边区域作为研究案例地,因为这些区域均为北京的热门旅游景点,周围聚集了大量的旅游从业人员,其中也包含本文所研究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主要职业类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为了保障问卷的内容效度和科学性,本研究在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原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工作人员、旅行社工作人员、旅游管理专业教授等)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北京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含3个部分:(1)非正规就业者的旅游活动信息。主要涉及被调查对象是否在景区景点、旅游购物场所、旅游交通进行旅游相关经营活动。(2)职业认知状况。包括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3个题项。采用Likert 5点量表,要求被调查者在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非常满意)中选出最能代表自己实际情况的选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3)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旅游非正规就业”之外的职业)、学历、来源地、就业类型(旅游非正规就业)等。

在正式问卷发放之前,课题组在案例地进行问卷的预调查,并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了初步分析。之后,根据分析结果和受访者的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并由此形成了本研究的正式调查问卷。而后,课题组在案例地进行正式问卷发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近年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持续推进和城市管理部门的严格管控,目前北京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范围正逐步缩小。为确保被调查对象的来源准确性和可靠性,课题组在选定区域内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在剔除不完全作答和所有题项答案均相同的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75.7%。

样本特征如下:性别方面,女性略多于男性,占比分别为58.6%和41.4%。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及以下占比超过九成(94.3%),其中初中及以下的占比为23.8%。年龄方面,18~30岁的群体占比最高(52.5%),其次为31~40岁(17.6%)和41~50岁(17.2%)。来源地方面,59.5%的被试来自临近的华北地区,其次是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和西北地区,占比分别为12.3%、11.9%、7.9%。旅游非正规就业的职业类型方面,其他(如街头手艺人)占比最高,为47.1%;其次是导游人员和纪念品/土特产商贩,占比分别为27.3%和16.3%;旅游食宿服务提供者、旅游司机、

景点门票摊贩占比最小, 分别为 4.4%、3.5%、1.3%。

三、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状况, 如表 1 所示。职业满意度的均值为 3.06, 积极态度占比为 27.7%, 中立态度占比 55.9%, 消极态度占比 16.3%。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 3.19, 积极态度约为 37.9%, 中立态度约为 46.7%, 消极态度占为 15.4%。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 3.35, 积极态度占比为 46.2%, 中立态度占比为 43.2%, 消极态度占比为 10.6%。可以发现, 受访者的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较低, 而主观幸福感则相对较高, 但仍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表 1 受访者的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积极态度/%	中立/%	消极态度/%
职业满意度	3.06	0.823	27.7	55.9	16.3
生活满意度	3.19	0.844	37.9	46.7	15.4
主观幸福感	3.35	0.867	46.2	43.2	10.6

(二)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涉及的 9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 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 且都在 0.01 水平达到显著。其中, 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 ($\gamma = 0.731$, $P < 0.01$), 超过 0.7, 说明两者间的相关性相对较强。而生活满意度与职业满意度 ($\gamma = 0.582$, $P < 0.01$)、职业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gamma = 0.559$, $P < 0.01$) 两对影响关系中, 相关系数均超过 0.5, 表明这两对变量存在着中等相关关系。上述结果, 为进一步研究主要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奠定了基础。

表 2 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								
2 年龄	-0.084	1							
3 学历	0.031	-0.756 **	1						
4 职业	-0.104	0.258 **	-0.225 **	1					
5 来源地	-0.070	-0.158 *	0.102	-0.026	1				
6 就业类型	-0.061	-0.251 **	0.253 **	-0.095	0.030	1			
7 职业满意度	0.063	0.038	-0.028	0.042	0.030	-0.052	1		

表2 (续)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8 生活满意度	0.062	0.126	-0.122	0.089	-0.067	-0.130	0.582**	1	
9 主观幸福感	0.146*	0.035	-0.066	0.162*	0.036	-0.052	0.559**	0.731**	1

注: * $P < 0.05$, ** $P < 0.01$ 。

(三) 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假设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三者间的影响关系,本研究分别进行了3次有控制变量的多元线性阶层回归分析和1次有控制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2以生活满意度为结果变量。其中,模型1引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来源地、就业类型等6个控制变量;模型2检验职业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模型3~6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其中,模型3同样引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来源地、就业类型等6个控制变量,模型4检验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模型5检验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模型6检验生活满意度在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充当的中介效应。由表6可知,职业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Model 2, $\beta = 0.589$, $P < 0.001$); 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Model 4, $\beta = 0.572$, $P < 0.001$); 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Model 5, $\beta = 0.750$, $P < 0.001$)。研究假设 H1 ~ H3 得到验证。

表3 阶层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控制变量						
性别	0.111	0.041	0.290*	0.223*	0.207**	0.196*
年龄	0.028	0.015	-0.022	-0.035	-0.043	-0.044
职业	0.029	0.019	0.085*	0.075**	0.063**	0.063*
学历	-0.020	-0.025	-0.030	-0.034	-0.014	-0.018
来源地	-0.004	-0.007	0.005	0.003	0.009	0.007
就业类型	-0.036	-0.027	-0.008	0.000	0.018	0.017
自变量						
职业满意度		0.589***		0.572***		0.197**
生活满意度					0.750***	0.637***
常数	3.037***	1.438***	2.706***	1.152**	0.427	0.236
R^2	0.037	0.363	0.058	0.351	0.572	0.595

表3 (续)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F	1.393	17.855	2.270	16.896	41.840	40.059
ΔR^2	0.037	0.327	0.058	0.292	0.514	0.244
ΔF	1.393	112.389	2.270	98.603	263.035	131.6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的检验已经满足了一般中介效应检验的前两个步骤。为验证生活满意度在职业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在控制职业满意度变量后引入生活满意度,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显著(Model 6, $\beta = 0.637$, $P < 0.001$)。再加上生活满意度之后,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Model 4, $\beta = 0.572$, $P < 0.001$)虽然有所减小(Model 6, $\beta = 0.197$, $P < 0.01$),但仍然显著,说明生活满意度在该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Bootstrap抽样检验法进行分析,设置抽样次数为5000次,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所对应的95%置信区间为[0.258, 0.504],不包含0,表明该中介作用是稳健的,因而研究假设H4得到验证。

(四)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性别的调节作用,首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标准化处理后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相乘来构造交互项。其次,将自变量、控制(年龄、职业、学历、来源地、就业类型)和调节变量(性别)放入阶层回归模型自变量的第一层;将交互项一次放入第二层自变量。其中模型7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职业满意度为自变量;模型8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职业满意度为自变量;模型9以主观幸福感为结果变量,生活满意度为自变量(表4)。

表4 性别的调节效应分析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Model 7	Model 8	Model 8	Model 9
控制变量				
年龄	0.025	-0.019		-0.039
职业	0.014	0.067*		0.063**
学历	-0.012	-0.015		-0.013
来源地	-0.006	0.003		0.009*
就业类型	-0.027	0.000		0.019

表4 (续)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	
	Model 7	Model 8	Model 8	Model 9
自变量				
职业满意度	0.601 ***	0.589 ***		
生活满意度				0.749 ***
调节变量				
性别	0.034	0.212 *		0.206 *
交互项				
性别 * 职业满意度	-0.134 *	-0.071 ***		
性别 * 生活满意度				-0.052
R ²	0.387	0.399		0.576
ΔR ²	0.024	0.048		0.004
F	17.203 ***	18.088 ***		36.972 ***
ΔF	8.410	17.516		1.81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由表4可知, ①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模型7), 性别与职业满意度的交互项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eta = -0.134$, $P < 0.05$), F 值呈现出显著性, 且 R^2 变化量为0.024, 表明性别在职业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②以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模型8), 性别与职业满意度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eta = -0.071$, $P < 0.001$), 且 F 值呈现出显著性, R^2 变化量为0.048, 表明性别在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③在模型9中, 性别与生活满意度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明性别在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并不存在调节作用。因此, 研究假设H5a和H5b得到支持, 而H5c被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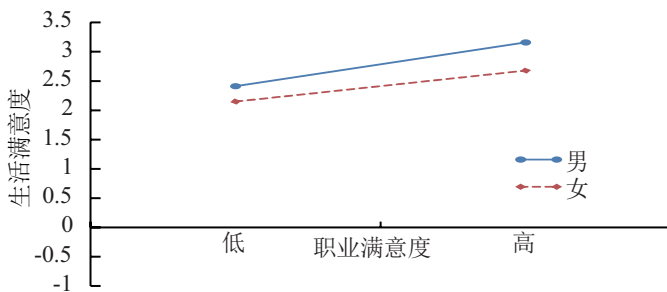


图1 性别在职业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中的调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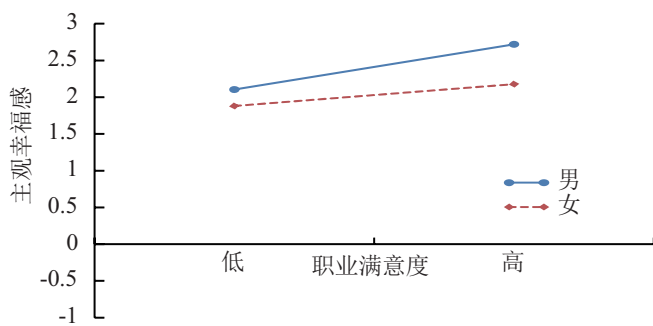


图2 性别在职业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中的调节效应

为了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性别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男性非正规就业者和女性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实线与虚线分别表示女性与男性对职业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之间影响关系的强度。由图1和图2可知,实线的斜率高于虚线,这表示对于男性旅游非正规就业者而言,职业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对于女性旅游非正规就业者而言,职业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程度相对较弱。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问卷数据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者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结论如下: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均较低,可能是因为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较不稳定、工作环境较差、收入水平通常偏低,同时还经常遭受到社会排斥以及政府部门的严格管控,甚至驱赶和打击,致使他们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对职业和生活的满意度较低,主观幸福感也不高^{[4]33,[9]66,[27]58}。可以发现,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是一群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特殊人群,他们的工作和就业境况往往不如人意。未来如何改善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是一个重要课题。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在职业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一般来讲,非正规就业的就业环境相对较差、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会显著降低非正规就业者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较

低的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也会间接影响劳动者的幸福感^{[24]134.[29]}。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有必要首先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以提升其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进而增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性别在职业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相较于女性,男性感知到的职业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这可能是由于一直以来,女性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且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较为明显的性别歧视,进入传统就业部门存在较大的壁垒且在平衡“家庭—工作”时间方面面临一定的困难。当生活压力较大时,由于非正规就业部门具有可进入性较高、工作时间较为灵活的特点,使得非正规就业成为女性的第一选择,此时女性既要完成“传统观念”赋予的家庭劳动任务,又要为家庭生产生活承担相应的责任^[30-31]。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职业满意度只是她们众多“职业”心理状态中的一种。故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对就业所带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不甚敏感。

(二) 边际贡献

探索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人群规模并探索其生活和认知状况有助于发挥旅游非正规部门的正面效益效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学术价值方面。以城市为尺度,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群体生活和工作认知状况(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进行探讨,论证了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有助于厘清非正规就业背景下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旅游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理论研究,加深对城市化进程中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理解。②实践价值方面。本研究探讨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和主观幸福感等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有助于相关管理部门基于民生视角对非正规就业科学化治理制定相关政策,进而提升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质量和主观幸福感,并助推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高效发挥其积极效应,提高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质量。

(三) 管理启示

当前,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民生问题,亟须进入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轨道。为实现对旅游非正规就业部门的有效监管,切实提升非正规就业的就业质量,根据前述研究结果并结合新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目标,本文提出以下实践建议:①正视非正规就业现象的存在,明晰并规范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质量,通过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服务监管体系,做好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信息管理,为做好市场治理和服务监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②加强对旅游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尤

其是对女性非正规就业者, 提高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 逐步缩小该群体与正规就业者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并促进旅游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③积极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进行扶持和帮助, 定期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咨询、就业技能培训等服务, 以提高他们的生计能力, 从而提升其职业和生活质量感知。

(四)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首先, 本研究的调研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市典型旅游区域的抽样调查。尽管前期根据相关管理者和专家的意见, 设计了较为合理的调研方案, 但是未能对北京全域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进行全面调查, 这可能导致本文的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因此, 未来有必要结合不同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活动规律, 选取尽可能多的调研地点, 并对其他职业类型的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进行深度调研。其次, 本研究仅使用调查问卷作为收集数据的方式, 利用定量方法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初步探讨, 未来可以采用深度访谈、内容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其背后的成因展开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 [1] KATZ L F, KRUEGE A B.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 [J]. *ILR Review*, 2019, 72 (2): 382—416.
- [2] 赵新宇, 郑国强.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非正规就业: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 (4): 163—173.
- [3] 邢祖哥, 黄耿志, 薛德升. 中国非正规经济发展格局及与城镇化的关系: 基于多指标多原因 (MIMIC) 模型的研究 [J]. *地理研究*, 2022, 41 (3): 597—615.
- [4] 张若阳, 付萧萧, 章牧, 等. 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居民的社会排斥感知研究: 以珠玑古巷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9, 34 (5).
- [5] 郭为, 黄卫东, 余琴. 旅游共享经济与非正规就业: 对供给侧改革下就业问题的思考 [J]. *旅游论坛*, 2017, 10 (4): 76—85.
- [6] NILSSON P Å, PETERSEN T, WANHILL S. Public support for tourism SMEs in peripheral areas: The arjeplog project, northern Sweden [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5, 25 (4): 579—599.
- [7] GRIFFITH H D. Beach operation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ourism in Barbados [J]. *Caribbean Finance and Management*, 1987 (3): 55—65.
- [8] STEEL G. Local encounters with globetrotter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 (2): 601—619.
- [9] 孟威.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污名化研究 [J]. *旅游学刊*, 2020, 35 (6).
- [10] 梁增贤, 黎结仪, 文彤.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生活质量感知研究: 以广州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5, 30 (9): 72—81.
- [11] BANGASSER P E. *The ILO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R]. Geneva:

- ILO Employment Paper, 2000: 9-13.
- [12] CHEN Y, XU Z.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Chinese Economy*, 2017, 50 (6): 425-433.
- [13] 尹晓颖, 闫小培, 薛德升. 国外非正规部门相关概念辨析及启示 [J]. *世界地理研究*, 2007, 16 (1): 21-26, 39.
- [14] MONTERO - MORAGA J M, BENAVIDES F G, LOPEZ - RUIZ M. Association betwee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health status and the role of the working conditions in Spai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020, 50 (2): 199-208.
- [15] 万向东. 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条件与效果 [J]. *管理世界*, 2008, 20 (1): 63-74.
- [16] SLOCUM S L, BACKMAN K F, ROBINSON K L. Tourism pathways to prosperity: Perspectives on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Tanzania [J]. *Tourism Analysis*, 2011, 16 (1): 43-55.
- [17] 梁增贤, 赵昭, 肖莹瑶, 等.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 [J]. *旅游论坛*, 2016, 9 (5): 62-69.
- [18] 苏静, 陆林. 非正式部门 (informal sector): 旅游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 [J]. *旅游学刊*, 2009, 24 (1): 71-76.
- [19] 梁增贤, 保继刚. 主题公园周边非正规就业管制的堵与疏: 以北京欢乐谷为例 [J]. *城市问题*, 2012 (4): 67-72.
- [20] ÇELİKÜĞÜZ S, KAYA İ.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ourism [C] // VCIKUR T. *Global Issues and Trends in Tourism*. Sofia: KlimentOhridski University Press, 2016: 518-526.
- [21]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 (1): 34-43.
- [22]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 (1): 71-75.
- [23] 邱红, 张凌云. 中国青年人教育程度异质性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J] *人口学刊*, 2021, 43 (6): 85-93.
- [24] 卿石松, 郑加梅. 工作让生活更美好: 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6, 37 (4).
- [25] 丁述磊.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 38 (4): 57-67.
- [26] 费星星. 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 [D]. 合肥: 安徽财经大学, 2020.
- [27] 王海成, 郭敏. 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政策的合理性 [J]. *经济学动态*, 2015 (5).
- [28] 沈啸. 2019年北京市接待旅游总人数3.22亿人次 [N]. *中国旅游报*, 2020-03-03 (2).
- [29] 张抗私, 丁述磊, 刘翠花. 非正规就业对居民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 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J]. *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7, 37 (9): 65-76.
- [30] 卢青青. 半工半家: 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 (3): 402-410.
- [31] 李沐纯, 韩冰晨. 乡村振兴背景下影响女性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因素 [J].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2 (5): 54-60.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Urban Tourism Informal Entrepreneurs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WANG Jinwei^{1,2,3}, SUN Jie^{1,2}, WANG Guoquan⁴, QIAN Lili⁵

(1.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Beijing Tourism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24,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5.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ultural Tour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Informal employment in urban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ourism formal employment, which contributes to ease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timulates urba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ourism services. Taking Beijing as the study case, this paper uses mathematical – statistical method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urban tourism informal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urban tourism informal employment groups are relatively low;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life satisfaction; both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life satisfac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gender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n in – 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occupational situation, livelihood and well – being of urban tourism informal employment groups, and can provide decision – making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management policies.

Keywords: urban tourism; tourism employment; informal employment;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